文明的边疆

从远古到近世

张国刚 著

丝路文明新解

从凿空之旅到中欧交往
穿越千年丝路
文明从孤立走向共生





中信出版集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 / 张国刚著 .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2020.12
ISBN 978-7-5217-2118-8

Ⅰ . ①文… Ⅱ . ①张… Ⅲ . ①丝绸之路－文化史
Ⅳ . ①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151190 号

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

著　　者：张国刚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25　　彩　　插：10 页　　字　　数：229 千字
版　　次：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217-2118-8
定　　价：6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动力机制

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碍于自然条件，其规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国家诞生以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便更多受到社会中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前，规模尤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徂东，是双向互动的。

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最早栽培了小米（粟），最早培育了水稻，是稻米的发源地，中国将这两种农作物传播到世界。其后，大约 4 000 年前，西方培植的小麦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印欧人迁徙用的轮式马车，很可能也影响了殷商的马车式样。中国早期的青铜技术比较粗劣，受到欧亚草原东部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取得进步。不同于西方的青铜器往往作为工具来使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更多是作为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中的礼器。先秦时期，甘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明显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也是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冶炼钢铁技术已经独树一帜，以至于博物学家老普林尼都称赞，“赛里斯的钢铁雄冠其时”。

从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论，战争的动力作用不可无视。战争是野蛮的，却也是开拓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动力。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既是人类群体的自由流动，也伴随着战火纷飞；它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大交流，也带来了血与火的杀戮和掠夺。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推动了希腊化文明向东方拓展。所谓希腊化文明，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亚洲各地区文化在马其顿军团的铁蹄下融合的产物。波斯帝国时期，丝绸之路的驿站和道路已经修建完毕，到汉武帝开通西域，正好实现了对接。

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野蛮时代诉诸战争，随着文明时代的推进，这种动力机制变得多元而且复杂，战争本身也不完全出于经济或财富目的。

首先是出于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的需要，这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一个维度。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前 138 年），还是东汉和帝时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都肩负着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无论是唐德宗贞元元年（785 年）杨良瑶海路西行，还是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 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秦汉以来，北部疆域的最大威胁来自匈奴。秦修长城，汉公主和亲，都是从防守层面保卫边疆。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足以主动出击，保护边民与疆土的安全，因此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寻求与同样曾遭受匈奴侵犯的大月氏人结盟，共同抗击匈奴，这才有了“凿空”的壮举。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西北边地兵力后撤，给吐蕃进犯的机会，唐代宗时期甚至打到了长安。继位的唐德宗命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

伯帝国），就是希望对吐蕃形成牵制，缓解唐朝西部边境的军事压力。

丝绸之路的经略历来是中原王朝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张骞通西域打开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稳定与互信，为丝绸之路畅达提供了保障，也是和睦西部与边疆地区胡汉关系、维护边境地区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巩固了汉朝往西部投送力量的能力。汉宣帝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轮台，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副郡级单位），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其后，呼韩邪单于前来归附并和亲，“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汉代采取移民实边之策，蚕桑业在河西走廊发展起来，居延汉简里多次出现“桑”“帛”等字，汉酒泉郡禄福县出产的丝绸被称为“禄帛”。唐朝安史之乱之后，战乱使河西走廊地区的蚕桑业迅速走向衰颓，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隋唐时期对于西域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贞观四年（630年），西北各族君长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修筑“参天可汗道”，既是尊重唐朝的宗主国地位，也是为了加强和便利与唐朝的交通往来。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唐太宗进一步在周边和域外地区推行羁縻府州新体制。与羁縻府州相辅而行的是册封制度。羁縻府州的首领在被封为刺史、都督的同时还对内称王，这个王在名义上是被唐朝册封的。这种册封是一种政治主导地位的宣示。借助军事、经济和文化更先进的唐朝的权威，域外政权对内可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当地的统治，对外则可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可以从朝贡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

不过，安全与互信也取决于朝廷对国家安全状况的评估，这以明代嘉靖时期最为典型。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崇道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丹，在北方拒绝边境互市，在南方严格施行海禁，原因是他对于边境安全状况存在严重的误判。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在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将的守护下，北方有“隆庆和议”，俺答汗以顺义王的名义归附，南方有漳州月港重新开海，海盗转变为海商。事实证明，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丝绸之路才会物畅其流，实现发展与繁荣。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与财政需求。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就总体情况而言，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来说，汉唐时期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有限。汉唐时期所谓的“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政治和解的代名词；五代至宋代不再有“和亲”，因为中原王朝处于弱势地位，时或纳贡称臣。无论是“和亲”，还是纳贡称臣，双方博弈的目的都是寻求中原方面开放边境互市。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若中原王朝处于强势地位，通常将双方的经贸关系称为“朝贡”，否则就称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与回纥的互市贸易，对于回纥来说是获得经济利益，对于唐朝来说则是维系政治关系。边境互市和开放海禁对于沿海地区的百姓生计影响巨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原王朝的经济影响则相对较小。

与朝贡贸易不同，宋元以后的市舶贸易展现出比较纯粹的经济诉求。唐朝在广州设有市舶使，宋代以后成为市舶司。市舶贸易是宋元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贸易通过对商品的“抽解”和“博买”，为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我们很难对海上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精确统计，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时，广泉两州加两浙路每年贸易总额应在千万贯以上。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 年），岁赋总入应在一亿贯左右，进出口总额约占 1/5，

超过两千万贯。据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所载，南宋政府每年总收入不过四千万贯，市舶收入竟占 1/20。[1]

宋朝出于财政经济目的，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民间商人从事贸易受到的限制条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官职。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民间商人纷纷投向海上贸易，使唐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也使政府使节附带进行的贸易行为显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缩和对朝贡贸易的限制，也导致把贸易领域更多地留给民间海商。正是这些为利益奔波的广大民间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贸易的高潮，泉州地区至宋朝方才形成显著的出海贸易风习。除了五代时期闽国政府的鼓励之外，有学者认为，10 至 12 世纪泉州地区的大批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该地区海贸习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且一旦成为习俗，就代代传扬，终成该地区的基本特色。[2]

总之，巨大的经济能量是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虽然茶叶的原料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也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期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时期又加入了茶叶。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市场，而不同时期又都有新的热销产品加入丝路贸易中来。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以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学知识以及航海

[1]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75 页。

[2] 张彬村，《宋代闽南海贸习俗的形成》，刊《海交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动力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远洋航行。对信风周期规律的发现与运用，对亚洲季风环流规律的发现与应用，都是开辟海上丝路极为重要的因素。5 世纪初，法显就是乘坐海船从斯里兰卡回到广州的。中国的指南针以及领先的造船技术，也支撑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 15 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及 15 世纪末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以及海图绘制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这些知识的进步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四个维度是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知识对人的吸引力。汉唐时代，无数僧侣排除艰难险阻，东来弘法，西行求经，不绝于途。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传入西域，新疆地区的考古依据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正史记载，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准许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开来。但是，佛教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先是胡僧入华传教，支娄迦谶、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后来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使得汉传佛教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佛教宝藏。佛教音乐、雕塑、绘画大大丰富了中古世俗文化与艺术。三夷教（即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隋唐时期入华，也成为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景观。

对于域外世界的好奇同样牵引着仁人志士奔竞于途。张骞通西域之后，带回了关于西域和南亚地区的新知识，引发之后朝廷多次遣使，汉武帝甚至号召民间使团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虽然迄今仍众说纷纭，但是政治、外交目的必定是首要的，而获取海外资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费信

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等实地考察记录带来了大量海外信息，也丰富了时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此同时，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物料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质入华，使明代工匠积累了制作硬木家具的经验，对于明代家具工艺的进步有重要影响。进口陶瓷原料苏麻离青（或称苏勃泥青），深刻影响了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的样式和风格；也有观点认为景泰蓝的工艺发展也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对这些工业原料的追求刺激了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

毫无疑问，有关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活动，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民间贸易的积极性是有很大差别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开展边境互市贸易、官方朝贡贸易（勘合贸易）的首要诉求。民间商业活动则以利益获取为主旨。也有许多仁人志士怀抱宗教热忱或者追求知识的理想，奔竞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促进了丝路的繁荣与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前138年

张骞出使西域

前330—前30年

希腊化时期：中西文化的接榫

前第2千纪

印欧民族大迁徙，最早的东西方文明互动发轫于此

目录

Contents

序 言

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动力机制

第一篇

凿空之举

从文明的边疆到西眺罗马

第一章 人类的童年与文明的边疆 -003

第二章 远古神话中的东方与西方 -013

第三章 希腊化时期：丝路之前的中西文明交流 -027

第四章 凿空之举：张骞出使西域 -044

第五章 东汉与罗马：丝路帝国的遥望 -056

第二篇

诸神入华

东来传经与西行求法

第一章 从西域神僧到中土大唐：佛教入华 -071

第二章 从敦煌飞天到杨贵妃的胡旋舞 -085

第三章 景教入华：唐代的基督教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01

第四章 中古丝路上的粟特商人 -119

第五章 中古丝路上的“西游记” -13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篇

季风南海

陆上丝路的衰落与海上丝路的兴起

第一章　天方海舶：宋元南海“香瓷之路”-151
第二章　《马可·波罗游记》：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 -166
第三章　三保太监郑和与航海王子亨利 -177
第四章　晚明盛清的中欧贸易格局（上）：双屿港与海上走私 -188
第五章　晚明盛清的中欧贸易格局（下）：澳门与广州的离岸贸易 -194

第四篇

想象异邦

中欧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第一章　“利玛窦规矩”及其意义 -211
第二章　明清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政治 -223
第三章　欧罗巴的“中国趣味”与紫禁城的“西洋风”-234
第四章　礼仪之争：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244
第五章　18 世纪晚期中国形象的逆转 -255

终　篇

历史视野与现实观照

第一篇

凿空之举

从文明的边疆到西眺罗马

1至2世纪

丝路两端的东汉与罗马帝国

第一章

人类的童年与文明的边疆

远古时期，人类走出非洲，播迁于世界各地，最终形成了以五大文明为代表的人类古文明。童年时代的人类文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文明，诞生在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

在欧亚大陆，这些古文明犹如星星点点的绿洲，总是遭受周边游牧部族的威胁。或者因为气候的变化给山地和草原牧民带来灾难，或者出于对文明国家财富的垂涎，在绵亘东西的北方草原上，从公元前第 2 千纪开始，发生了一场持续千年的民族大迁徙，迁徙者络绎不绝。然而东西流动只是通道，南下侵入文明城邦或国家才是目的。世界五大古老文明在印欧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下，或涅槃重生（如印度与中东文明），或孤苦伶仃以待新生（如地中海的希腊文明），或交融互补进而发扬光大（如商周时期的中华文明）。

一、人类的诞生与文明的起源

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公元后第三个千年的第三个十年。

追根溯源，人类的先祖大约在 250 万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

上；而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本身又是亿万年中大自然万物进化的结果。

早期的人类先祖虽然能够直立行走，但是脑容量比较小，肢体还带有猿的特征，所以被称为猿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约在50万年前或更早的时候，人类的先祖逐渐发明和掌握了三大生存技能，即石器打击技术、人工取火技术、分节语言能力。虽然生活资源依然来自采集和狩猎，但是随着工具的进一步改进，他们开始将火用于取暖、照明、烧煮食物。

到了距今2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化到了智人阶段。智人阶段的人类有更强的迁徙能力，当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非洲，于5万至6万年前到达大洋洲，于3万年前到达亚洲，于1万多年前到达美洲时，已经属于现代人类了。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人类逐渐分化为不同肤色和体型的群体。现代人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他们躲过了第四纪冰川的劫难，在距今15 000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个时候，威胁人类生命的凶猛动物大大减少，人们的经济活动也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2 000年至10 000年前全新世到来后，地球的气候逐渐转暖，更加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于是，采集逐渐发展成农耕，狩猎也演进为畜牧业，这些变化被称为农业革命。距今6 000年左右，地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盛期，气候和环境更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文明之花首先在适合农耕的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东亚黄河流域绽放。人类文明进入了茁壮成长的“童年时代”。

农业革命是人类古文明诞生的前提。例如：西亚是小麦、大麦的故乡，其种植大约发生在9 000年前；东亚有粟、黍、水稻、蚕桑，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粟、南方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距今都有

近万年的历史；美洲在公元前7000年就培育了土豆、玉米、红薯等。总体来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温暖湿润、适合农耕的河流附近诞生的，其形成时间距今8 000年到5 000年。

苏美尔文明最早在两河流域诞生，古巴比伦文明也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楔形文字、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汉谟拉比法典》等是其熠熠生辉的表征。关于两河流域的文明史，从形式上看，表现为来自北方的印欧人和来自南方的闪米特人争相抢夺这块肥沃的农业资源。

与苏美尔文明同期或稍后，尼罗河流域诞生了古埃及文明，金字塔、象形文字、成熟的王朝管理系统是其璀璨的成果。在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带坐落着两个国家：南亚的印度和南欧的希腊。印度河流域的本土文明哈拉巴文化（早于公元前2000年）、希腊爱琴海周边的米诺斯文明（约前2850—前1450年），在与中东上古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产生了变异与创新，逐渐成长为新颖别致的新文明形态。

在遥远的中国，则诞生了伟大的华夏文明。2019年，良渚文化（距今约4 300—5 3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历史，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事实。距今约4 300年的石峁文化时期，大约就是《史记》中记载的“五帝”时代。司马迁笔下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构建起华夏文化的血缘谱系，夏商周三代乃至春秋战国的各个诸侯国都自称黄帝的后裔。此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等，也体现出中华各地域文化的原创性特征。现代考古学家用“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来形容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的宏大格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